

自然的重置与控制的消解

——从中西比较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变革

代砚春

摘要：从中西比较的视域看，西方现代化进程开启于对自然的误置，自然被剥离了神圣性和内在完满性成为理性之人的控制之物，而后它被置入资本逻辑的社会架构中成为资本增殖的附属。“控制自然”成为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和理论支撑，其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实现了对自然的时代性、历史性重置，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它主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消解“控制自然”的现代化发展定位，实现人与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态观变革为世界现代化建设塑造了一种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顺序性的价值关切。它以生态观念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打开了人类走向生态未来的广阔空间。

关键词：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5—001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①。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标识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观变革，即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亦步亦趋按照西方冷战胜利者的意识形态构建生态话语体系，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主探索生态话语体系的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文明内涵的集中表达，这决定了它超越了传统原始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朴素共生”，获得了全新的历史内涵，即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生态理论，而是一种以生态为解释原则的文明观，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表征。

一、现代化的两种倒错与控制自然观念的误置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东方从属于西方”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最为根本的历史境遇。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生态问题迅速凸显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生态问题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度，这使得资本主义设想的经济无限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CKS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代砚春，男，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增长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同时，现代社会普遍奉行的发展理念受到了严重挑战。然而，形形色色的西方生态学运动都为资本主义做出了辩护，尽管观点不同、形态各异，但它们都力图证明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彼时，西方社会的话语论调和评价环境是“中国崩溃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启动改革开放不长时间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理论的主流声音去认识自身发展的生态问题。这自然导致以下观点，即西方生态学的研究直接为中国构建自身的生态话语体系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无疑制造了逻辑上的双重倒错：其一，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说，西方生态学思想的批判对象是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的理论外观和内在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反思。而当代中国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社会历史图景的倒错决定了人们需要侧重于挖掘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的积极的预防和借鉴意义，而不能对西方国家相关理论简单移植、拿来即用。其二，从理论的逻辑起点上说，西方生态理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种实践的结果，改革开放历史性地变革了现实中国，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将西方生态学思想纳入历史视野的根本目的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生态思想，而非仅仅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主流思想之后。事实上，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理论受时代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已经趋于萎缩，一方面，民众的生活环境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正在下降；另一方面，生态政党的政治话语权逐步丧失，其社会诠释力和影响力愈渐式微，生态政治运动随之变得消沉。相反，生态文明建设却在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前景。

按照威廉·莱斯的研判，西方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规划和意识形态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控制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可以说，“控制自然”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两种全然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现代化规划。问题是，从直接性的、事实层面看，“控制自然”的思想确实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先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且最终凝结为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信条，而如今它却成为各式各样生态学思潮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这样一种情状提醒人们，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对自然的误置。

在历史的演变中，古代自然观认为自然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和完满性，人们对于自然的基本态度是敬畏和惊叹，而取用自然之物大多需要经由严肃的礼式和祭祀。基督教神学认为，精神是自然的创造者，它由此能够主宰自然，而作为上帝造物中唯一具有精神能力者，人享有精神对自然的控制权。在这个意义上，“控制自然是先验的，……控制自然作为宗教观念属于‘人本身’”^②。可以说，基督教的精神遗产规定了人作为自然之主的身份和地位。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启蒙理性“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③，重要的是，它拆解了神学中精神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性，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的神圣和完美，而是将之看作客观存在物的物质世界。培根力图使这种精神的教义世俗化，“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确证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力—支配”关系，将自然科学技术指认为人类统治自然、改变自身生存境况的力量和手段。这为人们增加了这样一种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④。显然，“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却契合了资本主义精神，即“以人的‘理性’取代‘神圣形象’而构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50页。

② [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③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9页。

的价值标准”^①，于是，它很快就成为通行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信条。

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精神的世俗化中介已经隐含着一种工具关系，而真正将西方现代化推入高度工具主义自然观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们看来，自然是资本财产的组成部分，是供人类开采的资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转换备好了货币这一价值中介，将自然纳入资本运行的体系中，自然物被兑换为货币价值，按照资本市场意图来控制自然有助于人们尽快地从自然的界限中解放出来提高生活的福祉。控制自然的市场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和掠夺，只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把自然财富作为一种形式的资本加以保护和增加”^②。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化自然的态度充分彰显了启蒙以来人类对理性的充分信赖以及对控制自然命运的十足信心。问题是，控制自然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真的受理性的规范和引导吗？启蒙的教益乃是人类的解放和自我的实现。“控制自然”的目标由此与人类自我实现的目标一致。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启蒙理性的引导，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发现自然本身的法则找到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与启蒙的乐观主义相比，法兰克福学派对“控制自然”这一理念表达了质疑和担忧，在他们看来，近代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理解成为一个数学模型中的物，使得自然被抽象为一个与思想完全分离的纯粹外部他者。通过自然的数学化，蒸发掉了人类的欲望，异质性的自然物被还原为一种可测算的数量关系，自然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结构便能够在人们的观察和分析中得到揭示。结果就是，“由于被剥夺了任何自主的生命力，自然容易根据人类的意志没有节制地被操纵”^③。法兰克福学派看出了启蒙的诡计，即人们之所以要在思想中将自然分离出来是为了将自然变妆并以自己设定的方式来控制自然。为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内部关系的辩证法，显然，自然并不单单是一副“数学—物理学图像”，科学的自然并不是真实的自然本相，自然“既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的东西又是一种内部现实”^④。换言之，启蒙将人们的需求永恒化了，它将对外部自然的控制需求扩展到了对内部自然的统治上，“随着支配自然力量的一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这种荒谬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⑤。“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⑥。

现今情况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完成了从“自然人”到“宗教人”再到“经济人”（economic man）的主体身份的转变，自然则从神学体系中解脱出来再一次被误置于资本的逻辑架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精神—自然”的关系转变为“物—物”关系，并且后者全面修改了人的社会关系。“人类征服自然的宏大事业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轨道，在人与自然斗争的掩盖下重新展开了人与人的斗争，对自然的控制变成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⑦更重要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它要求人们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将发展生产力看作了第一要务。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和解构了“控制自然”这一理念的原初构想，它将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目标直接等价于资本的价值问题，于是，解决环境问题也就随之成为一个经济核算问题。一言以蔽之，“控制自然”不再是人类关于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历史构想，而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直接表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可见，自然落入资本的彀中，最终表明培根式的“控制自然”不过是现代化的乌托邦。

① 孙正聿：《现代化与现代化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③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152页。

④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⑤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Mass, 1973, 34.

⑥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38.

⑦ 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二、西方现代化的生态规划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代启示

资本主义以控制自然观念作为基本信念和理论支撑,开启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直到今天形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格局。因其开启现代化之路时间上的优先性,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资本主义通向现代化。但是,不管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还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控制自然的问题越来越被理解为纯粹的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经济问题。其运行方法是:一方面,资本家在生产中将自然资源变成大宗商品,为了尽可能压低生产成本,它们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力度;另一方面,资本家在消费中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资本市场来诱发和制造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无穷的需求和欲望连接着无穷的商品生产,这使得自然的转换没有了止境、没有了限度。结果是不仅造成了生产浪费,还因触及自然的极限而破坏了生态环境。

为了消解资本控制自然导致的生态问题,当前西方生态学学者拿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深绿”思潮看到,控制自然的思想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表现,它无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只要人们将自然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避免人类文明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们就能获得一种生态和谐。

“浅绿”思潮则坚信,只要人们坚守生态价值判断,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修正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调整现代科学技术,辅以相应的环境决策,现代人就能顺利度过当前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清晰地看到了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和现有的社会结构。为此,它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认为当务之急是变革社会制度,在实践上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等新举措,引导生态运动走向阶级运动,维护后发展国家和穷人的利益,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

不难看出,这些生态思潮维护的仍然是西方现代化的中心立场。从根本上说,它们的方案都是探索西方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都是为了更好地释放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潜能;都是基于西方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辩护。归结起来,这些资本主义的绿色理论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或是在于市场或是在于科技。前者的说法是,上帝创造自然,而人创造了经济。现代化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对自然规律的信仰;而启蒙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市场规律,自从“上帝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进入市场受“无形的手”来调控。因此,人们只能市场中赋予环境适当的价值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后者则例举了现代化的发展事实,即随着人类科技革命的推进,自然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对自然危害较小的生产方式得以掌握,人们完全可以期待无限进步的科技能够一举解决自然的极限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为解决生态问题准备好了说辞的同时,却在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转嫁生态危机。一方面,它们将公共的自然资源通过市场关系转变为私人财产,并利用法律体系将之合理化;另一方面,它们动用空间格局,将污染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生态问题转化为区域发展问题。

这种做法彻底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的排他性和反生态特质:其一,因受工具理性支配,“只见经济不见生态”的现象,提供的决策信息是否具有生态有效性有待考量。其二,西方现代化并没有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的巨大财富造福人类,相反,它却带来了生态危机。科技的社会运用与其合理性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这使得科技本身也成为现代化问题。从时间维度上,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面对的重大问题,如果仍然采取这种转嫁危机的现代化模式,那么,生态问题不仅不会按照资本主义现代化设想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相反,它会愈加凸显出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对生态问题的考察需要回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考察,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原初批判中,通过其生态思想的构建更迭人们的现代化意识,找寻人类未来的发展出路。

人们熟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论断,马克思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但是他从“人化自然”^①出发,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②,而人既不是黑格尔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学观念中的肉身化也不是费尔巴哈纯粹自然性质的类本质的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是社会地、历史地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看来，“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②，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③。

马克思著名的两大论断，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④，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⑤是其人本主义的思辨话语，它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断言了人与自然的和解状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控诉，他所要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是以道德呼喊、价值批判的方式在场的。由于现代化的历史错位以及主观解读方式的不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崇的人本主义马克思的做法一度抱有极大反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正是消解自然的神圣性，将“控制自然”的观念注入给了“拼命追求满足尘世需求手段的特殊的人”^⑥。这样一来，人类“控制自然”的做法已经完全成为功利主义事业，再也没有道德约束了。由是观之，《手稿》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诉求，所提示的工业现代化的建设应始终有道德在场则成为一种生态警示。

直到新世界观的出场，实践取代了人本主义的道德抽象成为缝合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马克思直接指认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统一，并且是基于工业现代化社会的统一。显然，这里的实践说的是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生产活动。自然是实存的但也是历史的。它不是绝对理念实现过程中沉沦于物的异己化的客观环节，也不是单纯直观中的一般感性自然，后者是离开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的自然观。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⑦。显然，马克思已经拒绝使用控制自然的传统自然观定位，他用历史的社会的实践去统一人与自然，使自然与社会互相渗透，人与自然双向改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确立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⑧，正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面对自然时，后者只能对自然物现成采用，即“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⑨，人们能够在创造性的物质生产中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在人类实践水平的动态发展中，在人类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得到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史就是人类历史展开的过程。那么，如何定位和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历史”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控制自然是资本的内在固有属性，“生产过程从简单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⑩。因此，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从资本逻辑的运动中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即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工业现代化的商品生产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⑥ [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6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思想，他认为，劳动“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①。申言之，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从而成为一切社会形式的自然条件，但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构成了区分不同社会形式的基础。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正是在资本逻辑的座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资本全面改写，形成了对资本的依赖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天然生产的需求畸变为资本增殖的需求，在被命名为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同时，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对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另一方面则对自然进行最大限度的索取。结果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因资本的强势介入发生了断裂，马克思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他所目睹的资本主义对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掠夺、滥用和破坏，并将这些现实的控诉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与共产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③。只有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介的共产主义才能超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价值呼喊，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真正统一。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三重内涵

当前，西方社会通过自身的调整成功地解决了一些生态问题，甚至可以经常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呼吁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扛起保护生态的责任，这造成了西方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假象。真实的情况是，“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没有从其当前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真正清除出去，资本主义无限的“生产—消费”方式与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之间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现象仍然频发，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承认其“控制自然”的思想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原初本性，还破坏了人类自身的自由本质和未来发展。它甚至狡辩，生态问题的发生更像是单纯的自然本身进化的结果。显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来说，只要它仍然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如何在资本体系内部消化和改善生态环境，现代化的道路就仍然是锁闭的，而人类的未来也仍然无从谈起。

目前有一种基于现代化错位的论调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为了尽快跟上西方现代化的步伐，控制自然的观念将在社会主义国家再次发生。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说法，它虽然看到了社会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生态问题。但囿于价值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有意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原则性差异和实践区别。究其根源在于，它仍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而不能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独特的内涵逻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当然，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局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曲折，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表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就在于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不仅是一种人类的生态观变革更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塑造了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的绿色发展观

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技术理性首先是一种为控制而斗争的工具，它坚持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通过与资本的联姻，将主体同一性逻辑注入了资本的发展机制，使得后者将全部人类的生命活动都统一到由价值规律及其权力所支配的单一系统中，它对自然的控制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将这种观念推广到人们的现代化生活中，就不仅造成了片面发展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还造成了“控制自然”概念的美化。也就是说，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资本将其对自然无限掠夺开发的行为歪曲和美化有效控制自然的开发水平以保证人们获得充足的物质利益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

显然，技术理性支配下的西方现代化造成了两种虚假：其一，生态中心主义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仍然坚持的是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人类发展优先还是自然保护优先的问题在资本逻辑的座架下，是个虚假的现代化问题。其二，技术理性强调通过技术的发展控制自然，这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技术应用甚至可能会将高度的生态风险与较小的社会效益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已对人类社会推出了技术合成物，如各种白色垃圾等，而自然却无法通过自身代谢将这些科技物消耗掉。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理性通过控制自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同样是个虚假问题。在技术理性的控制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将生态问题的解决理解为如何利用资本的力量恢复人类与自然的非异化关系。这决定了西方现代化仍然把问题限制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用人本主义的自然观或是生态主义的人类观来置换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大量的生态运动仍是道德呼喊。显然，在保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寻求解决生态问题对现代化的生态改造是于事无补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试图塑造一种生态理性发展观。简单来说，即是关注生态计划与发起、管理它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确立了“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历史统一关系，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作为出发点，着重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拒绝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发展观念，实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对自然概念的重置。从正面说，它要求人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①；从反面说，它让人们意识到“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②。这种生态理性观是以生命观为内核的。一方面，生命具有保存自身的本能。将生态保护提升到像人们保护自己的感官系统一样的重要地位，意在指出人们尊重和保护自然理应成为现代人的自然本能，中国式现代化将这种保护自然的生命本能内化到人们的生活观念中，相对的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将控制观念内化为其生活的本能。另一方面，生命具有生成的权利。人们尊重和顺应自然内在的演化规律就是尊重自然本身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差异性，从尊重自然的先在性到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再到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生命生成性的辩证演化历程，它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观念那种对生命生成的阻止和压抑。后者不明白，自然的反抗和报复是对人类生命非自由生成的一种警示。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塑造了社会历史演化进程的中国式价值关切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来说，人类从人的依赖性存在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③的存在；从社会层面来说，即是人类从自然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被全面客观化的物质关系所掩盖。它盛行的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它设想的是人类能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去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就可以为一切人服务从而实现人类的普遍利益。它的目标是“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而要求现实幸福，文化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而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而要求天赋人权”^④。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正是在这个世界中，资本成为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存在。它具有一种“‘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⑥，并且它还会形成一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作为保守力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空前的自然人化，将自然纳入了市场经济寻求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④ 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⑥ 白刚：《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的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总体规划，这种现代化的目标有一个基本承诺：它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优越性，从而将资本主义固化为“历史的终结”“千年王国”，承诺人与自然的问题也势必将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消解。显然，这是一个“非历史”的任务，本质上，它是以资本这一西方现代化的绝对性、终极性标准来规范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关切。

与之相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则构建了一种顺序性的人文关切。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确保人对自然支配的控制，因而确保对生产力发展的控制。社会主义对自然和生产力的控制不会转而反对自然并进而反对人类本身。资本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灾难及其他全球问题，只有根本变革社会关系，才能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公正和平衡的关系”^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在驯服资本和驾驭资本的前提下，探讨合理解决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以“和谐共生”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调性，并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②。这就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上，即在自己的时代水平上对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做出的中国式选择。在西方现代化终极性的价值关切中，作为主体的资本决定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人与自然是支配性的层级关系。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序性价值关切中，人与自然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生态学理论解释范式的消解，二者要达到的是一种动态的功能性平衡，不再是支配与反抗的两极对立关系。以终极性追求为使命的西方现代化将资本作为超历史的、非历史的标准，最终它关于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都变成了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资本的话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序性追求，则既是基于中国国情对历史文化的承诺和尊重，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安排和选择，这决定了它势必将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在一种顺序性的选择中努力达成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生态观的理念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

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制造了一种进步逻辑，它将人类社会带入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且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而自然也被纳入其中。马克思发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简单说就是资本与财富的无限增长与其有限的占有和分配直接的矛盾。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依赖自然，但是，它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消费破坏了自然本身的条件和内在界限，而这反过来又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产生损害和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现代惯性势必造成生态危机的发生，而生态危机的发生则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自反性”机制的当代表征。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描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必将被扬弃从而为共产主义准备好生长空间。同时，人类将会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阶段上的自由个性”^④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扬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问题，或直接说就是超越和瓦解资本逻辑，实现人类发展的文明形态的变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所理解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治决策和社会决策的文明发展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① [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7—1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资本对于自然的压制和支配模式，强调“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它将人们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人”设定转变为一个“生态社会人”，使得“人成为合乎自然的人，自然成为合乎人性的自然”^②，进而将生态需求与发展需求协调起来，以人们生态权益的获得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它从单纯的以经济为目的的现代化建设转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③。这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成果。而这也这就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保障生态正义，即确保生态产品在人类代内与代际间分配的公平性，以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将生态文明的实现发展成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事业”^④。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衡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尺度，将一种生态保护理论植入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中，这种中国式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从理论维度塑造人类新的时代精神，拓宽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实践空间。

The Reset of Natur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Control: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View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AI Yan-chu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process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begins with the misplacement of nature. Nature was deprived of its sanctity and inner perfection and became controlled by rational people, and then was placed into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apital logic and became the subsidiary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Control nature” has become the basic planning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of the whole Western modern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rup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riggering an ecological crisis.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rsu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has realized the epochal and historic reset of nature, and requires “respecting nature, conforming to nature and protecting nature”. It advocates dispell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ontrol nature”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has shaped a way of thinking from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o ecological rationality for the world’s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d a Chinese sequential value concern. With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cept, it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opened up a vast space for humanity to move toward the ecological future.

Keywords: Western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0页。

② 卢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视域下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24页。

④ 李熬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及其现实启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⑤ 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